

● 韩保江 著 ●

西方世界的

现代西方收入分配制度变迁与贡献

拯救



社

西方世界的拯救

现代西方收入分配制度变迁与贡献

西方世界的拯救
——现代西方收入分配制度变迁与贡献
韩保江 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政编码: 250001)
日照市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875印张 2插图 260千字
1998年7月第1版 199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7-209-02268-6
F·658 定价: 19.00元

目 录

0.

导论：“谁”拯救了西方世界

- 0.1 “谁”拯救了西方世界 (2)
- 0.2 理论生长点与贡献 (6)
- 0.3 研究方法 (14)
- 0.4 逻辑与结构 (17)

1.

人类理性与收入分配制度选择

- 1.1 人择制度 (20)
- 1.2 “经济人”假设 (25)
- 1.3 稀缺性假设 (34)
- 1.4 不确定性假设 (39)
- 1.5 分配中的交易成本与制度设计 (42)
- 1.6 制度分析的其它辅助假设 (45)

2.

收入分配交易与制度约束

2.1 收入分配维度	(49)
2.2 收入分配、交易与制度	(54)
2.3 交易成本、外部性与分配制度创新	(68)
2.4 收入分配制度的决定	(83)

3.

收入分配制度变迁机制

3.1 收入分配制度变迁模型	(95)
3.2 “市场势”决定的分配制度变迁	(117)
3.3 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约束	(131)

4.

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因素分析

4.1 科技革命及对分配制度变迁的决定	(145)
4.2 国家角色:从“守夜人”到“总资本家”	(156)
4.3 工会力量与劳资关系调整	(165)
4.4 市场力量:垄断竞争与收入分配决定	(177)
4.5 意识形态:思潮与价值观	(193)

5.

初次分配制度变迁:劳资谈判与政府援助

5.1 劳资谈判:初次收入分配的核心机制	(207)
5.2 “成本加价”外部性的管制:收入政策	(229)
5.3 政府援助:两种“激励与约束相容”的分配制度	(238)

6.

再分配制度变迁:政府强制

- 6.1 学习与理性:“大危机”后的反思与制度供给…………… (258)**
- 6.2 政府主导的财政政策变迁 …………… (283)**
- 6.3 政府推动的社会保障制度变迁 …………… (295)**
-

结束语:分配制度变迁与西方世界的未来 …………… (330)

主要参考文献…………… (333)

后 记…………… (341)

导论：“谁”拯救了西方世界

分配问题是人类永恒的主题，由于受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下的“有限或相对稀缺的产品世界”的约束，人类发展过程中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不可避免地要探寻如何规制人类的分配行为，实现合作与秩序，进而增大社会福利。因此，人类有目的地变迁分配制度（在本书主要指正规制度），也就或了伴随分配问题这一永恒主题的永恒的人类实践。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在这个特殊阶段中人类又如何规制分配行为，去适应它的社会发展，实现其制度变迁主体的最大利益呢？本书选择这个特殊历史阶段中的片段——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分配制度变迁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决定和影响当代资本主义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因素与机制，特别是重点研究西方政府如何自觉变革和创新收入分配制度，缓解劳资冲突与市场供求矛盾，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和减少经济波动与社会震荡，从而最大限度地适应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以此侧面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仍然能够生存与发展的原因。

0.1 “谁”拯救了西方世界

在我的孩提时代，正是“文化大革命”波涛汹涌，“左”的思潮肆虐泛滥的年代。“资本主义是腐朽而垂死的”，“资本主义正一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天好起来”的宣传不绝于耳。由于当年的幼稚无知和闭关锁国所带来的“信息闭塞”，我对此更是深信不疑。然而，伟大的“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使国人“理性”地了解了外面“精彩的世界”。人们在坚信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①的伟大论断的同时，已经开始实事求是地审视当代“垂而不死”的资本主义及其发展，并积极探寻当代资本主义何以生存与发展，有时甚至堪称“繁荣”的根源。

在西方，早在本世纪 30 年代，当经济大危机无情袭击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撼动了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当“供给能够创造需求”的萨伊信条被打破，自由竞争市场机制崇尚者不知所措，资本主义向何处去面临抉择之时，历史发展的契机推出资本主义历史上两个伟大人物：罗斯福与凯恩斯。他们不约而同地从实践上和理论上探寻着经济危机这种西方痼疾的症结与药方，寻找着西方世界复兴之路，拉开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序幕。

大危机的原因究竟何在？浅薄的“福音说”把它归为发怒的上帝的惩罚；“咖啡馆哲学”则把它看成是若干年丰裕和繁荣后若干年贫困和苦难的周期性“报应”。更多的人则认为大危机是政府干预扰乱了自由放任的“天然常态”所致。然而罗斯福与凯恩斯出于阶级的局限，虽然不能清晰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无力承受、容纳和驾驭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资本主义基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12 页。

本矛盾激化这一诱致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但他们在冥冥之中却都意识到生产相对过剩在于“市场需求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而需求不足的根源却是由于国民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均和两极分化,导致大多数人生活贫困和购买力停滞与下降。那么,要刺激需求,摆脱危机,靠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的“市场机制”只能适得其反。唯一出路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实行“政府干预”。并且政府干预的手段和重点之一就是要进行“制度创新”,强化财政手段,变革分配制度,创造有效需求。从那时起,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主体,特别是当代西方政府,根据其生存环境的变迁(主要是科技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能动地变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即生产关系)也就变成了稀释和缓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包括企业内部矛盾,以及企业内部矛盾外化后的市场矛盾和社会矛盾等)的手段或工具。收入分配制度变迁也因此变成维系当代资本主义生存与经济发展的“内在稳定器”与“引擎”,^①并且有限地适应和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

本书并无意宣扬“分配决定论”或“分配制度决定论”,但经过研究发现,分配制度的变革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兴衰的确有其特殊意义。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与其生产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生产无限扩大与消费者购买力低下的矛盾是引致资本主义制度陷入困境的根源。而对这种双重矛盾的解决,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主体的国家(政府)和企业无非面临三种选择:其一是变迁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国有化或公有制。这

^① 在这里,我们说收入分配制度是市场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内在稳定器”和“引擎”,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各类行为主体的物质利益,如果通过变革分配制度,处理好分配关系,就能够化解社会矛盾,调动各类行为主体的积极性(包括劳动积极性、积累投资积极性、技术创新积极性等),并能有效地约束主体行为,从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条路可以走,而且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但从根本上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相悖,除非有特殊时期或特殊的契机(如战后经济恢复时期的国有化运动),但我们觉得这不是常态,80年代以来风行于西方的私有化浪潮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说西方国家政府或企业必须改革所有制,那么最大的可能也只是实行有限的私有制。换句话说,即使要摆脱经济危机,西方国家也不会轻易变革作为其社会经济基础的私有制,而只能在其实行形式上进行有限地“扬弃”,如推行各种形式的股份制。因为要从根本上变革其所有制的成本为最高(这等于是一种社会制度的自我否定过程)。其二,维护现存的私有制,而不考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然而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又证明此路不通。那么,其三,能否在其一、其二的两难之中找到第三条道路呢?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主体选择了作为“生产关系反面的分配关系”的调整,即变革收入分配制度的方式去适应迅速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规模无限扩大的趋势。虽然这仍是一种有限的适应,但它却有效果,并且对于制度主体来讲,是一种成本较低,风险较小,收益满意的选择。首先,无论是国家干预变革,还是企业内部自觉选择(成本收益比较),选择诸如集体谈判、最低工资法、分享经济、职工持股等新收入分配形式,不仅可以保证资本增殖源泉的劳动力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而且从初次分配开始就有利于缓解生产扩大与购买力低下的矛盾,甚至可以缓和劳资关系,调动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为扩大资本积累创造条件。其次,通过由政府主持的国民收入再分配制度的创新与变迁,不仅可以有针对性地通过财政收支这种收入再分配形式,如各种财政政策,调节利益关系,以刺激劳动者和投资者两方面的积极性,以及影响社会总供求,减少经济波动,保障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而且可以有针对性地通过创建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提高国民素质,减少社会冲突,稳定社会秩序,为资本再生产创造宽松的

外部环境。加之战后西方国家许多政府(特别是社会民主党执政)信奉改良主义,又使政良主义思潮与改良主义行为大行其道。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主体,以变革分配制度作为维系其制度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是理智和必然的选择。我们认为科学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发展及趋势,收入分配制度的变迁研究是最重要的窗口。然而国内外系统地对西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纵向动态变迁过程研究的文献不仅少,而且比较肤浅,基本上是动态的描述和静态的结构分析。因此有必要从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主体利益和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要求入手,研究其分配制度变迁的内在机制和变迁轨迹,并以此来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脉络。这也是笔者撰写本书的初衷之一。

选择西方收入分配制度(突出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变迁作为本书的研究对象的第二个初衷,则是想从中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借鉴点什么,或经验?或教训?或兼而有之。众所周知,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然而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中,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会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虽然我们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人们的共同利益及国家有效的宏观调控,可以避免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必然出现的一些矛盾与问题,但我们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如何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利益分配问题;如何解决分配中的激励相容、公平与效率矛盾及其兼顾的问题;也要寻求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关系以保证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减少动荡,创造宽松的市场经济运行环境等问题。那么我们究竟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吻合,能兼顾公平与效率,激励相容,并有利于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新的分配制度体系(当然仍以按劳分配为主)呢?我认为,可以通过当代西方市场

经济运行中,具有“引擎”和“内在稳定器”双重功能的收入分配制度的弥合和变迁过程,获得宝贵的启示。比如,借鉴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运行中通行的集体谈判分配制、分享制、职工股份制的初次分配制度,以及再分配过程中的各种财政分配制度与政策实施中的经验与教训,社会福利制度实施的经验与教训等,进而通过博采众长,综合提炼,最终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中国现代收入分配制度。

0.2 理论生长点与贡献

本书旨在进行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制度理论研究,是想立足于马克思的累积循环的制度变迁逻辑,以一定的制度变迁环境下组织、权力、交易、规则等诸制度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为主线,以利益关系分析为核心,综合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理论、新旧制度经济学说的理论精华,构建现代西方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

马克思与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综合

马克思作为伟大的制度学家,首开制度变迁理论之先河,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为指导,独创了解释人类社会演进,以“能动的人”为枢纽,“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累积循环的制度变迁理论。强调生产力性质、水平、发展要求与各个层次经济制度之间的内在矛盾对制度变迁的决定性作用,特别重视技术变迁导致生产力发展,从而提出制度变迁的要求和契机。同时也强调一定社会阶段制度主体出于自身利益而变革制度,以反映或适应生产力性质、水平与发展要求的能动性,而方而辩证统一,推动社会发展。

现代著名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则以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

的方法论为指导,以“成本—收益”分析为工具,以相对价格变化和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最大化为动机,构建了其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三位一体的制度变迁理论。

我们承认,马克思与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之间,由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巨大差异,自然在理论体系和基本内容上有很大出入,那么究竟能否找到两大学说之间的共性或互补性,并应用于建构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理论框架呢?回答是肯定的。作为两大制度经济学说,首先在研究对象上就已经有了共同点。因为诺思的制度经济学明确以规范人类行为和利益关系的规则及其变迁规律为研究对象。虽然马克思一次也没有明确制度的内涵为规范人类行为和利益关系的规则,但在他所有的有关生产关系、政治关系、所有权制度、工厂制度、法律制度中,都隐含了作为“制度一般”的“规则”的涵义。这与诺思的制度涵义基本吻合。并且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首要目的和精髓就是揭示生产关系各种制度的量变与质变的规律和趋势。因此,相同的研究对象就构成我们综合两大制度经济学说的理论前揭和基础。其二,作为人类行为和制度变迁动机,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①。并且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体系的核心是通过论证经济利益矛盾与社会经济制度的辩证关系中建立起来的;在具体分析人类如何能动地设计制度,以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时,马克思也隐含应用了“经济人假定”,特别是在具体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各类行为主体的制度变迁与选择行为时,如资本主义社会的财产制度、劳动雇佣制度、工资与剩余价值分配制度等的确定,马克思都是依“经济人”的人格特征,去定义“资本家”(即“资本的人格化”)和“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即“总资本家”)的。而诺思则开诚布公地直接以“经济人假说”为前揭,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2页。

以“成本—收益”比较为工具,以利益诱致为动机,从分析制度变迁行为入手构建制度变迁理论,核心也可以说是“利益关系”。如果说马克思制度理论中的“利益与制度变迁的关系”更具有一般性、抽象性,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话,那么,诺思制度理论中的“利益与制度变迁关系”则具有具体性和可操作性,二者可以有机结合。其三,在马克思循环累积、辩证统一的制度变迁模型中,强调了“能动的人”的枢纽作用,也从原则上阐述了人类应该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技术变迁),来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且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些制度还可以通过影响“能动的人”的物质利益关系和行为,反作用于社会生产力。那么,“能动的人”究竟怎样起“枢纽”作用呢?马克思只是隐含使用了“经济人假定”,而并没有具体明确。相反,诺思制度变迁理论中“成本—收益”比较的“经济人”及行为分析,刻画了“枢纽”的形象。(至少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变迁中制度变迁者的行为是这样,并且可以用于分配制度选择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家选择收入分配制度时,如以计件工资取代计时工资,就是把资本家作为唯利是图的“经济人”来看待的)因此,我们结合后两点,把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理解为抽象的方法论或者“宏观”制度变迁理论,诺思的理论则可以看成是具体的或“微观”的制度变迁理论。从抽象到具体、从“宏观”到“微观”两种理论相辅相承、有机综合,便成为我们构建当代西方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理论框架的基础。其四,在制度变迁方式上,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强调,在阶级社会里,由于阶级矛盾激化而导致革命式的变迁,但也重视自我完善改革的渐进式变迁,与诺思的边际调整、连续性渐进式变迁有异曲同工之妙。至于对制度变迁绩效的评价标准,虽然马克思从宏观的社会生产力发展以及社会公平上把握标准,而诺思从交易成本的高低予以评价,但仔细分析二者也能相互补充。正因为制度运行中交易成本的存在才致使生产要素投入不能按

“技术关系”转化为产出,从而原有制度成为生产发展的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说,诺思把制度变迁看成了经济增长的关键,反映了马克思的生产力标准。总之,我们还可以再从许多方面找到两大制度变迁理论中的可综合点和互补性,何况我们也无法否认马克思理论会影响诺思的理论,因为诺思自己也承认:“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作用,以及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潜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①他认为这些方面也正是他所要关注的。这里挂一漏万的罗列只是想表达作者的一个主旨,就是想从马克思与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综合中找到我们构建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生长点。

西方新旧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综合

新旧制度经济学,所处时代不同,自然命运有别。凡勃伦与康芒斯的传统或旧的制度经济学由于强调理性的经济行为人的新古典方法理应放弃,转而坚持将经济行为置于其文化渊源中来分析,因而一直被当时的人们视为“离经叛道的异端”,而无法归入主流,所以根本无法与所谓“经济学正宗”的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相提并论。凯恩斯经济学取代了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上升为新的“经济学正宗”后,制度经济学的地位依然故我。直到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凯恩斯经济学鼎盛时期已过,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地位才有所改变,成为与

^① D.C.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 1994 年版,第 68 页。

“正宗”分庭抗礼的“异端”学说。^①然而以科斯与诺思为代表的更新一代制度经济学家的制度理论，一改制度经济学前人的离经叛道，把其制度分析直接纳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正宗”体系，以避“异端”之嫌，故而早得正果。^②这新旧制度经济学的“正宗”与“异端”之别是否就说明它们之间果然毫无瓜葛呢？因答仍是否定的。它们之间不仅联系密切，而且一脉相承。无论是传统制度学家，还是新制度学家都以“制度及其变迁”为研究对象，因为不仅“事关形成经济行为和经济绩效的制度，是新、老制度主义的中心要义。”而且“他们都认定制度本身是历时变化的，并经常对经济因素有所反应。”^③首先，被尊为西方制度经济学鼻祖的凡勃伦理论，虽然对制度研究还不太系统，但他的“制度（凡勃伦的习惯）与环境互动”的“累积因果”变迁规律^④却始终为后人所遵从，特别“正是新知识，尤其是技术知识，改变了生活的基本模式，并最终改变制度和规范”的凡勃伦信条一直为新制度经济学者所继承。其次，作为集大成者的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从决策的政治和司法过程以及私人集体组织活动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制度演进。以“交易”即所有者合法权利的转移为制度分析的基本单位，阐述了其“集体（可以理解为组织）行动控制个体行动”，以及“冲突—依存—秩序”的制度与制度运行理论。其制

① 陈岱孙：《〈论加尔布雷斯的制度经济学说〉序》，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1页。

② R. 科斯和 D. C. 诺思因其制度经济理论成就分别获得1992年、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③ 马尔科姆·拉斯福特：《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可否架桥沟通？》，《美国经济问题杂志》，1995年6月号。

④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38页。

度经济学理论最终成为新经济史学家们制度理论的重要范本。^①第三,加尔布雷斯则别辟蹊径。从“组织、权力”角度阐述其制度理论,认为组织、权力与制度有机统一,作为组织的内部团结一致(有些类似于康芒斯的“集体行动”)获取“权力”,以“权力”赢得服从。^②并且从人格、财产和组织三种权力来源及三种权力行使与交易方式,即应得权力、报偿权力和制约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变动,论证了他的制度变迁理论。^③最后,所谓“正宗”的新制度经济学,无非是上述主要理论的综合与发展。其一,它在坚持新古典方法的同时,也继承了凡勃伦“将人视为文化产品”的老制度主义的观点,进而形成新制度经济学富有魅力的“意识形态”理论。因此,“如果我们认真考察一下诺思关于精神模型、意识形态和文化的重要性的论述,则我们想要断言,他试图在将人视为理性选择者的新古典观点和将人视为文化产品的老制度主义的观点这道沟壑间架起一座桥梁。”^④其二,它接受了康芒斯的“交易”概念,进而发展了作为其核心的基本范畴“交易成本”,换句话说,要理解交易成本,必须明确什么是交易。其三,它又从康芒斯和加尔布雷斯那里继承了“组织”(但没有像加尔布雷斯那样把组织作为权力来源)与“权力”(财产权)理论;进而形成它的组织(国家)与产权理论;其四,在继承和发展传统新旧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明确定义“制度”即组织之间权力

① 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中译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3页。

② 加尔布雷斯:《权力的分析》(中译本),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4页。

③ 同上书,第12~19页。

④ 马尔科姆·拉斯福特:《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可否架桥沟通?》,《美国经济问题杂志》,1995年6月号。